



西学中用 与时俱进

——陈淳教授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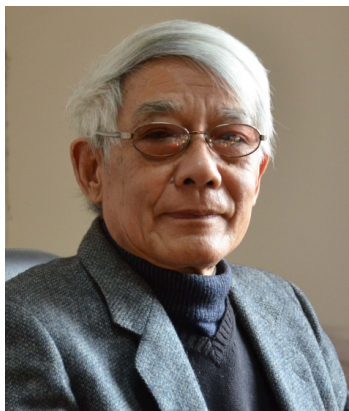
◆ 陈 淳

(复旦大学文博系)

◆ 张 萌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1948年5月生于上海。1982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教授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1982至1986年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1986年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攻史前考古学,1992年获博士学位。1996年回国,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执教。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等。



著作有:《中国猿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入选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成立25周年精丛再版);《当代考古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考古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远古人类》,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考古学理论》(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译著有:《手》(约翰·内皮尔),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欧洲文明的曙光》(戈登·柴尔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主编和审校的柴尔德其他译著有:安志敏和安家瑗译《考古学导论》、安家瑗和余敬东译《人类创造了自身》、李宁利译《历史发生了什么》、方辉和方堃杨译《历史的重建》,均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骗局、神话与奥秘——考古学中的科学与伪科学》(肯尼斯·费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考古学思想史》(布鲁斯·特里格,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诺埃尔·博阿兹和拉塞尔·乔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时间与传统》(布鲁斯·特里格)(重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考古学:理论、方法与与实践》(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中文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认同》(希安·琼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此外,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其他三本译著《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戈登·威利)、《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埃尔曼·塞维斯)和《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肯特·弗兰纳利)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受《南方文物》编辑部邀请,就读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张萌通过电子邮件对陈淳教授做了一席访谈。作为两代留学生的代表,他们对中美考古学在学术研究、专业训练和理论方法与实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问题深入交流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张萌:陈老师,您好,我是张萌,目前在美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受《南方文物》编辑部委托,对您做一次采访,主要涉及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还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公众关系等问题。

陈淳:张萌,你好。我们可以变通一下访谈的形式,主体是你问我答,但也可以互相对话,结合你在新墨西哥大学的学习谈谈自己的体会。

张萌:去年,您翻译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学界受到了很好的评价,虽然定价较高,但仍然有很多学生毫不迟疑地买了这本书。我们系的教授在讲授“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的入门课程中,有的选择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和戴维·托马斯(David H.Thomas)的教材,有的则选择伦福儒和巴恩的这本书。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对我有帮助很大。这本书既涵盖了欧美考古理论和方法的主流,也提供了很多来自世界的经典个案,对今日的中国考古学的意义十分重大。众所周知,这本书是中文版的第二版,也是英文版的第六版。您重译这本书,仅仅是因为原书版本的更新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陈淳:这本书出版后反响不错,感到比较欣慰。重译此书的目的,其实是想完我弥补中文第一版缺憾的意愿,2004年中文第一版(英文2000年第三版)出版后业内好评如潮。但是,由于多人共同翻译,各章的文字风格和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术语的中译也欠准确,人名和地名没有译成中文,感觉比较粗糙。重译这本书,一方面有它在国内学界良好的口碑,另外一方面是它四年一次的重版和内容更新。特别当它2012年推出全新彩版时,实在觉得是值得重译的时候了。美国自己的考古教材很多,美国高校可能偏爱采用本国学者编撰的基础教材。你提到罗伯特·凯利和戴维·托马斯两位的教材,我有托马斯写的那本书,感觉是典型美式的过程考古学范式。相比之下,还是伦福儒和巴恩这本教材比较适合中国的读者。我觉得,一门学科的基础教材非常关键,对于在校的考古专业学生,一定要有学科的世界眼光和前沿知识。我国的基础教育特别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专业训练也是这样。当然,这本书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学者也有实在的参考价值,特别是问题导向的探究和多学科的分析,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借鉴。

张萌:今年我正好在做我们系“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课程的研究生助理,授课老师用的就是凯利和托马斯的书,虽然简明扼要,较适合本科生入门,但几

乎完全集中在新大陆考古,对中国学者和学生而言,伦福儒和巴恩的书确实更有帮助。新大陆考古始于1500年前后,相比之下《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涵盖了时空广阔的新旧大陆考古,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占主体的中国考古而言的确是首选。您谈到中国的基础训练问题,我会自然而然地将中国的本科教育和我们系的进行比较。那么,在您留学麦吉尔大学期间,有什么切身的体会?能不能说一下您在IVPP硕士毕业之后,为何去加拿大留学,在那里对考古学教育有怎样的认识?

陈淳:你说得对,各国用自己编的教材无可非议。我国高校也偏好采用国内编的基础教材,这本东西一般作为参考书。我把这本书作为硕士生基础课程的教材,适合起点稍高的专业训练。对于本科教育,美国人类学系的课程应该是通识教育,并不确定专业方向,课程选择范围很广。而中国的本科教育似乎很快进入专业训练,而选课范围主要是与考古文物及历史相关的课程。



跟随贾兰坡教授读研

我在IVPP毕业后去了上海大学(当时叫复旦分校)。1985年宾福德和何传坤来华见贾兰坡先生,希望与IVPP做些合作课题,特别想探究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埋藏学问题,但是没有谈成,这是后话。当时,何传坤来信告诉我这一计划,贾先生也让我去北京陪同客人。同年我也作为宾福德和何传坤的客人,与其他几位国内学者参加了在丹佛召开的美国考古学学会(SAA)50届年会。何传坤陪同我们参观了怀俄明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一些考古遗址,观摩了美国学者的埋藏学分析和石器打制实验,这是我首次了解到新考古学和中程理论。这次访问的印象十分深刻,我感觉到中外考古学之间的明显差距,产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一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井川史子(Fumiko Ikawa-Smith)教授和她的丈夫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蒙特利尔大学菲利普·史密斯教授来校访

问,我做翻译和陪同。之后,井川先生愿意接收我做她的学生,故去了麦吉尔。1986年秋季入学时,系办公室秘书让我去布鲁斯·特里格教授办公室报到,他负责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在勉励了几句话后,他拿出一本近作《柴尔德——考古学之革命》签名赠我。在选课时,井川先生特别让我选听特里格教授的《考古学思想史》,这是本科生课。当时,特里格教授正在写这本书。对于初来乍到的我,这门课程听得非常辛苦。不但有语言的适应问题,还有知识背景不足的短板。麦吉尔人类学系当时只有三位考古学教授,特里格讲理论、井川讲东亚旧石器、迈克尔·比森(M. Bisson)讲打制石器分析。这些课程给我的感觉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太过陈旧且严重不足,需要重头学起,从零开始。当时面对加拿大的寒冬和大量阅读所见的陌生术语和内容,有一种背脊发凉的忐忑。你来美留学之前,已经看过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和伦福儒的书,在适应上容易得多吧?



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留学

张萌:2016年7月底,我刚刚参加了在怀俄明大学举办的垂杨介第21届会议。会中和会后我们参观了周边的几个著名遗址,第一次直观看到了千百只野牛的骨骼堆积在一起的壮观场面。一起与会的王颀和王春雪老师也都惊叹这样的遗址。领队在现场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推理过程,尤其是遗址的形成过程,分析了自然还是人类行为的原因,我也是第一次感到动物考古不是边缘学科,在一些遗址是核心研究。您的导师井川教授也参与了会议,做了两面器族群标识的演讲,很受启发。

我在新墨西哥大学的第一学期很不轻松,虽然在国内已经读过您翻译的《考古学思想史》,也读过社科院考古所组织翻译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还读过陈胜前老师翻译的宾福德的《追寻人类的过去》。当时有两大障碍,一是英语问题,要么听不懂,要么听懂了几句却插不上话,一迟疑别人都讨论完了,二是知识背景确实太弱。第一学期我只选了两

门课,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教授的《考古学史与考古学理论》和我导师劳伦斯·斯特劳斯(Lawrence Straus)教授的《欧洲石器时代》。我导师的课我几乎没有任何基础,算是英文课加阅读课,勉强跟了下来。《考古学史与理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虽然我们也用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但格雷夫斯教授主要讲的其它观点,很多是在批判特里格教授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他在华盛顿大学毕业,随后在亚利桑那大学读的博士,是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和威廉·朗埃克(William Longacre)教授的学生。他是达尔文考古学派的成员之一,侧重考古单位分析和复杂的序列研究,很接近生物学。第二学期上詹姆斯·布恩(James Boone)教授的《当代考古学中的争论》,又听到了另外的声音,包括行为生态、能动性,以及族群与身份研究。那时候我才意识到,系里教授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营和派别。也许,特里格教授也是欧美学术界的一派代表吧。

陈淳:我觉得这是中国留学生会遇到的普遍问题,突然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会感觉压力很大。现在美国考古学界应该与1960年代新考古学巅峰时期大不相同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本身就是一批不同的派别和松散的阵营,各自信奉不同的理论。这种百家争鸣应该是学术蓬勃发展的健康气象。多元化声音和多种理论途径使得考古研究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园地,始终具有新意。其实,特里格教授不善交际,也很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他不属于某个阵营,当年对新考古学多有批评。所以宾福德曾说,他很不喜欢特里格的文章。特里格教授在北美考古界应该算是一位独行侠。张光直先生也说他持论公平,不属于那门那派。伦福儒和巴恩在他们的教材里,因特里格教授强调考古学重建历史的作用而指称其为“传统学者”。不过,特里格教授的观点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这可以从各种文献里对他观点的引用看出来。我觉得学术研究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不同的思想和方法,这样一门学科才会兴盛,才会有突破。我国学界比较强调师承,强求一统。知识体系偏好中国自己的特色,考试要求学生回答标准答案。所以,当年宾福德访华后在美国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批评了中国的教育和考古学范式。他说,中国的教育模式十分异常,老师们不是用课堂知识来提高学生的理论能力和分析技巧,而是让他们把要点记下来,然后按照这些观点应付考试。他们把理论看作是天国里的泼阿斯所为,是某种空洞的胡诌。结果,中国的考古报告是因循守旧的典范,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东西。宾福德访华前让何传坤整

理和翻译中国的研究报告,仔细做了功课,所以对中国考古学的情况相当了解,批评也一针见血。当时,宾福德教授还在新墨西哥大学执教。你现在正好在那里学习,虽然物是人非,是否仍能够感受到他的影响?

张萌:宾福德在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如果说还有影响的话,可能第一是传奇,第二就是宾福德奖学金了。我导师现在所在的办公室就是宾福德以前的办公室,所用的桌子就是他亲手做的。宾福德给系里留下的“固定资产”可能就剩下他的桌椅板凳了,1990年代退休后离开阿尔伯克基,实木家具很是耐用,有个桌子仍然用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我们系的教授一直在轮换,现在任教的绝大部分是他走后来的新人,与宾福德也没有多少师承关系。我导师是他学生莱斯利·弗里曼(Leslie Freeman)教授的博士,前任系主任迈克尔·格雷夫斯是他学生朗埃克教授的博士,詹姆斯·布恩教授做过宾福德课程的助手,除了他们几人之外,现在拥有正式教职的教授与宾福德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大学系统极少允许留校,成了潜规则,避免近亲繁殖。其后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宾福德的学生广泛分布在美国很多高校,肯特·弗兰纳利(Kent Flannery)是第一批学生中依然在世的、活跃的学者之一,是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资格最老的教授。在传统强系中,尤其是亚利桑那大学、德州大学系统、怀俄明大学中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在海外深受他影响的还有克里夫·甘布尔(Clive Gamble)。陈胜前老师和我合译的《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即将出版,在和作者甘布尔的通信中,他也提到深受宾福德的影响,并尊为导师。北美学术圈系之间互相提供教学人员,资源也可以互补。我导师说宾福德既是天才,又是疯子,与奥法·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一系采取的研究策略不同,但都做全球研究,很了不起。去年,宾福德的学生罗伯特·希契科克(Robert Hitchcock)回到了新墨西哥大学,在系里做兼职教授,讲授“狩猎采集人类学”,尤其是把近四十年的卡拉哈里人类学和民族考古研究娓娓道来。在办公室里我们也提到了宾福德,都感到“宾福德效应”可以带动一个系的飞速发展,他离开后又回到以前的研究模式之中,比如比较侧重新大陆考古,尤其是北美和中美考古。

在这边求学虽然艰辛,但知识的系统性学习和高强度训练对以后的教学科研肯定是一笔最重要的财富。我想向您请教一些教学上的问题,主要是您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在麦吉尔大学博士毕业后,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回国的,并去了上海任教?在这么多年

的教学中,您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学生的勤奋程度、视野和毕业走向?在您的教学中,是不是发现国内的学生很难经受当年您在海外读书时的阅读量?

陈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你现在授业的教授都是新考古学第二代和第三代传人了。我对北美不留本校毕业生也很有感慨,这样可以防止近亲繁殖或形成学术宗派或山头。这对于我国强调师承一脉的传统是很值得反思的。

我出国留学就是想回来的。回国后我先去看了贾兰坡先生,他希望我能去IVPP,我自己也觉得要搞旧石器还是在北京最为合适。但是,贾先生和所里沟通后反应不很热情,所以我最后回了上海。在教学中也感到中外培养体制和路径的显著差异,考古学还是传统的教材,专业训练特别强调田野发掘和器物鉴定的基本技能。其实,高校学生特别需要培养理论和批判性思维,还有方法论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必备素质。当然划分地层、鉴定器物 and 分期分区这些基础知识很重要,但是没有理论方法的训练,这些实践操作只是技工或匠人档次的技能。结果,对材料的进一步研究就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这在研究生阶段特别明显,一些学位论文只是做材料的综述性整理和描述。缺乏理论指导和问题意识,论文也就很难写出新意,难有突破。过去,我在复旦上本科生课不用原来的中国考古学概论,而是用自己编的教材,介绍学科发展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此外,研究生阶段主要培养研究和思考能力,而这方面的有帮助的中文资料很少,所以我让他们阅读经典的英文原著,了解国际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培养他们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但是,这仍无法与国外研究生阶段的阅读量相比。现在招收的研究生基础、能力、悟性、兴趣和潜质差异较大,只能因人施教。还有,其他教授的课很轻松,如果我的课要求很严、强度太大也不合适,所以只能降低标准。现在大家普遍感到国内研究生的质量江河日下,记得以前我们考研时特别强调宁缺勿滥。现在有了名额限制,院系不愿意轻易放弃,于是成了宁滥勿缺,生源质量严重下降。还有就是研究生课程质量不高,针对性不强,学生只是混个学分,所以根本达不到美国高校的训练强度和水平。再加上没有类似美国博士生资格考试等严格的筛选和淘汰机制,所以我们的硕士和博士质量无法与美国比肩。现在中国高校热衷争创国际一流大学,但是培养的博士也应该是国际一流才行。你在美国一定也经历了高强度阅读的博士生课程和资格训练,不知有哪些心得体会可以

与国内读博的同学分享？

张萌：北美的博士资格考试可谓博士路上一线天。这个考试一般分为综合和专门两种，我系的专门考试就是开题答辩。我在此只谈综合考试，这是三天的开卷考试，72小时交卷，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答题。一道题可以细分为四五个问题，按《美国文物》(American Antiquity)的格式写出参考文献。12号新罗马字体双倍行距，不得超过10页，论证要有逻辑，个案支撑要有力，而且要谈出自己的观点。我在那三天几乎处于半失眠状态，交卷之后两天也没恢复过来。现在十分感激这个生死时速式的考试，我居然能在三天之内写出两篇高强度的论文，每篇百条参考文献，几乎是超常发挥。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对当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独立认识。虽然系里有备考文件，涵盖了很多基础知识，但是我觉得前人整理的内容和我的理解差别很大。于是，我决定从原典出发，构建自己的体系、在考试前三周时间里。我精读了《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考古学思想史》、《考古学：关键的概念》和《考古学理论导论》，并与英文原版对照。我还以十年为界，精选了宾福德五六篇论文，对他的每句话都做了分析，作为过程考古学的总纲。之外，我也精读了《社会不平等的基础》和《走向权力之路》，以应付社会复杂化问题。在精读过程中，我消化了许多以前不甚清楚的内容。在拿到考题之后，我选择了“能动性理论”和“民族考古学”两题，借助于陈胜前老师理论课上所读的《考古学理论手册》，对付了第一题。第二题则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的“莫斯特难题”，清楚地回答了“民族考古学”的问题。我在新浪博客“厚骨薄金”中提到，博士生课程的学习几乎是一部血泪史，您有兴趣可以打开看看。我想和国内读博同学分享的，可能就是阅读原典，把学术史梳理清楚。阐述自己的观点要有支撑，有逻辑，不迷信权威。另一建议就是以问题导向的探究，总会发现观点之间的冲突，在比较中思考考古学推理的逻辑。

在此，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联系您在麦吉尔大学所受的教育，国内考古学在课程设置上需要做什么改进？北美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后过程考古的发轫与历史学理论有直接关系，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在考古系内发展完整的人类学体系？

陈淳：你介绍的亲身经历表明，美国高校的读博过程像是脱胎换骨的炼狱。在美国读博八年十年的很常见，在资格考试和开题之前至少需要三年时间的修课、强化阅读和整理与论文相关的所有参考文献。这种高强度和高质量训练可以为论文和学术研

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使自己的职业生涯终身受益。美国许多大学的博士生入学后还要通过本校的硕士资格考试。所以，这样严格的把关和筛选，博士生的质量就有了保证。我国高校的博士生相对来说就轻松多了，只要入学基本就能毕业。博士生时间快的只要三年，论文基本上是块敲门砖。所以，现在很难看到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审阅这些凑合的论文和参加其答辩实在是件头疼的事情。

我曾经让一位学生做了中美高校考古学课程设置和培养计划的比较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本科开设的考古专业课不多，但是学生的选择非常丰富，在理论、方法、技术与实践上均有涉及。未来考古专业的趋势是偏向文化资源管理(CRM)，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是少数。所以，我国高校的考古课程也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调整和转型，从田野实践和学术能力转向遗产管理和博物馆教育类型人员的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综合性领域，包括价值评估、保护与管理，公众教育，文物法规，社会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还要重视文物工作的职业道德教育，今天我们看到的种种问题，与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的训练有关。美国考古学学会在1996年制定的考古学伦理道德八条原则已成为美国考古业界的准则，也是大学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完整和有教养的人”，具备思考、沟通、判断和认知能力；而不只是获取知识，或掌握某一方面的专门技能。美国大学希望学生学会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并能为学生今后人生的多元发展提供必要的准备。所以，美国大学本科阶段的专业课程比例不大，让学生有更多时间进行思考，鼓励学生的多方面发展，将专业知识的学习放到研究生阶段；并且重视理论，注重学生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中国的传统历来是以教师为中心，注重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积累与掌握，强调结论而不是鼓励学生探讨获得结论的过程。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标准答案”，与标准答案不同即为不正确。这种“求同”传统自然不会鼓励讨论和商榷，也不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启发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在具体专业课程方面，我觉得我国考古学最好逐渐增设考古学理论、方法论、科技考古、文化人类学、国外专门考古方面的课程。目前各高校普遍缺乏这方面的师资，发展还需时日。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如果培养的学生知识面太窄，势必不利于今后的研究与工作，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同质性严重，对学科长远发展不利。不知你对美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什么看法？

张萌：很同意您提出的课程设置的建议，因为课程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由于考古学在美国是人类学的分支，美国学生看到考古材料时会不自觉地与人类学问题联系起来，就像中国学生会直接想到考古学文化的问题和历史文献。凯利和托马斯的教材倡导的是人类学和科学，他们主要的思路是过程论，比如标本量够不够，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器物的形制是功能还是风格所致。美国学生的专业训练教始于研究生阶段，本科生绝大部分课程是人类学和必修的通识课程。他们第一节课绝对不会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更可能是人类学概论。他们还可以和研究生修同样的课，只是要求不同，各大洲的考古课程都可以选修；有的学生本科双学位，如考古学和地质学，所以基础比中国学生广泛和扎实得多。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必须的，做美国西南部考古的几乎都知道玛雅、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第斯考古。中国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基础的确扎实，但知识面较窄，在鉴定方面确实做得好，但缺乏全球背景、数据处理方法和通过考古推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您提到考古学理论的重要性，能不能进一步阐释一下？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我们的实践和分析有怎样的关系？

陈淳：北美高校好像还有跨校选课，在特里格教授的课上，我遇到过其他高校来选他研究生理论课程的几位本科生，与大家一起讨论，水平真是不错。

关于理论，我翻译和写过的文章不少。中国考古学缺乏理论思维，谈到理论总有两个误解，一是认为理论是西方的那一套，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二是一旦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总会有人说发掘材料更重要。我觉得有几个主要原因使得我们漠视理论的作用，一是我们的考古工作主要还是类型学和地层学，这是两种断代和处理材料的方法而非理论，主要凭经验。而文化历史学范式除了传播论外并没有其他的理论。二是我们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现象背后原因或动力的探索。三是我们的报告主要是描述而非解释。当考古学研究要说明社会变迁和文化异同的原因时，经验和直觉就不灵了，就必须依靠理论指导的探究。理论其实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说明问题的一种导向性思维。不同的理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不同。有了问题导向，我们便会选择和发明各种方法来解决它，知道需要哪些和多少考古材料来进行佐证。理论又是一种尝试性解释（提出假设或模型），对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逻辑推理的重建。正像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学者不相信理论，认为考古是凭材料说话。如果考古研究只是让材料自己说

话，自然不会有问题意识，也就不需要什么理论。最近陈胜前写了一篇博客《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反应热烈。有人不以为然，觉得他说法有偏颇，认为考古学研究的进步主要还是要靠田野工作，靠出土的新材料。他又在澎湃上回应了一篇《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在于偏重外在而忽视了自身的视角》，凸显了业内对理论和材料关系的歧见。我认为，材料固然重要，但是考古学家自身的理论水平、问题意识和分析、逻辑推理能力也许更加重要。出土材料再多再丰富，如果考古学家自身的修炼和能力不够，再多再好的材料也是白搭。“自身的视角”还包括对自身能力的反思，考古研究和解读是一种客位视角。观察是否对路，结论是否准确，是否带有现代人的偏见或一厢情愿的想象，也值得深刻反思。所以，田野发掘、基本材料的积累如果是这门学科的外功和条件，那么考古学家自身的理论修养，分析能力和阐释洞见则是内功。我们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出土材料决不逊色，如果研究成果存在差距的话，那肯定是内功的问题。所以，就考古材料日益枯竭的现状和不可再生的性质而言，内功的修炼跟不上材料的消失，确实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危机。

张萌：欧美的考古学理论出现有早晚，过程考古先于后过程，而特里格归纳的“早期功能—过程”则早于过程考古；达尔文考古学、进化—生态考古学和行为考古学来自对“新考古学”的发展和批判。面对众多的考古学理论，您认为在引入的时候是否应有侧重？若不引入，能从中国现有的考古学问题中发展出类似的考古学理论吗？

陈淳：欧美考古学的发展有从过程论向后过程论的发展，对我们只是借鉴的问题。过程论主要是文化的功能适应研究，它的指导理论就是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和怀特的新进化论，把环境看作是文化变迁和差异的主要原因。了解了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化，我们就能解释文化的变迁和异同。后过程论则强调人类思想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所以对过程论是一种补充。上世纪新考古学传入中国时，业内对其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不少。在了解了这种方法的精髓之后，现在大家已基本认同它的积极意义了。虽然在我们的实践中不叫过程考古学，但是目前国内流行的环境考古、聚落形态研究都是过程考古学的方法。我觉得，要真正发挥过程论的作用，还是要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环境考古、聚落考古都是方法，前者研究社会的功能适应，后者研究社会变迁。文化生态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态环境对社会和文化的制约，以及人类适应的方式和特点，并从环境的差异和

变迁来解释社会文化的发展。由于没有理论指导和问题意识,我们的环境研究往往只是考古报告后面的一份附录,没有从人地关系来观察和解释文化及其变迁的原因。所以,业内批评科技分析与考古研究是两张皮,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理论指导。考古遗址研究需要跳出器物分类和描述的窠臼,把各种器物看作是先民维持生计的手段,将它们的组合与特点放到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去分析,了解它们在维生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效用。这样才能使得器物与环境分析紧密契合,观察彼此的互动和变迁。

聚落考古也是如此,戈登·威利将聚落定义为“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他将秘鲁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分为生活居址、仪式建筑、防御据点和墓地四类,然后从八个时期区域聚落形态的历时变迁来看待这四类建筑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其中生活居址可以了解人口规模和结构,仪式建筑可以了解社会等级和政体的权威,防御据点可以了解社群间的冲突。所以聚落形态可以研究社会变迁,被誉为“考古学文化功能性解释的战略性起点”。欧文·劳斯(Irving Rouse)指出,聚落考古可以重建人类的生态、文化和社会系统,其中维生人群与专职人群的共存表明了社会复杂化的出现。在国内一些聚落研究案例中,有的对“聚落”的定义理解有误,以为是“聚居形态”;有的只是对遗址结构做更细致的分布研究,并未涉及社会结构及其历时演变。所以,聚落考古应该熟悉运用系统论。社群与环境是一种互动的系统,而社会内部也可以分为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亚系统。聚落形态研究就是要研究各个系统和亚系统的特点,观察他们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了解社会与文化运转与变迁。所以,虽然我们现在采用了一些过程考古的方法,但是并没有同步借鉴与这些方法相关的理论,研究结果就差之千里了。

理论其实是指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觉得中国考古学现在要创造自己的理论还为时过早,最好先了解和熟悉国外各种流行的理论,培养理论思考和问题分析的能力,然后再根据国情特点构建和提出自己的理论。当业界普遍意识到理论的作用,并开始自觉运用它们时,适合中国考古学的理论自己会逐渐发展起来。

张萌:我在吉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重点放在了环境考古和动物考古上,深感没有考古学理论的支持,自然遗存的研究只能成为边缘和附录,尽管它们与人类行为关系密切。没有考古学理论,考古科学(或科技考古)失去了科学的本义,只能沦为“高技术考古”,也是陈胜前教授阐述的“中国考古学家的

危机”的一方面。将考古材料的研究转化为有意义的考古学研究策略,需要提出适当的问题,突破“材料—考古学文化—族群”的对等关系,发展出“材料—行为—文化过程”的推理链条,回到“透物见人”上来,因为考古学者见到的首先是人类行为,而非“人群共同体”。建立在考古学文化基础上的族群研究需要更长的推理链条,主要根据脱离功能的风格。人类学理论虽不能指导考古学的研究策略,但可以提出通理性问题,如“文化的差异和变迁是如何产生的”,“人类的文化为何有的日趋复杂,有的则没有变化”,“为什么有的文化消失了,而有的持续了很长时间”,也可以与科学方法一起约束考古推理,使过程考古研究避免了文化历史的主观性,提出的观点可以在对材料的研究中得以检验。

您博士毕业后到了复旦大学任教,研究也扩展到了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引进了欧美众多的观点和个案研究,同时也对中国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思索和论述。在国内研究缺乏对人类行为变量的研究下,您是怎样进行考古推理,怎样探索与高层理论相关的研究问题的?为了让我们理解更为深入,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陈淳:这就是考古研究中理论和问题优先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理论指导,不去解决重要问题,那么科技分析除了给考古报告添上一些“科学主义”的色彩外,难以成为攻坚拔寨的一柄利器。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是国际考古学研究的三大基石。因为考虑到回国后不一定能从事旧石器研究,所以我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就开始系统阅读国外农业和文明探源方面的文献。这为我后来偏向这两个方面帮助不小。在高校接触田野和第一手材料的机会较少,但是只要有接触材料的机会,我还是尽力践行问题导向的理念,设法从材料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提供有理有据的阐释。比如,在小长梁的发掘和研究中,我考虑的问题是石制品技术的性质,因为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认为小长梁石器很小很精致,具有旧石器晚期的特点。我通过打制实验的石料分析,证明小长梁石制品看似小而精致是石料质地较好但裂隙发育的缘故,有的燧石片因质地好,看上去十分漂亮精致。所以,裴老和贾老认为小长梁石制品具有黄土期的特点,其实是受了石料假象的蒙蔽。我还用操作链分析了石制品的生命流程,重建了遗址的形成过程。在和安家瑗与陈虹对小南海石制品的再分析中,我思考的问题是该组合在细石器发展中的地位。因为国内学者都认为它是我国细石器技术的先声,并继承北京人文化,是华北

小石器传统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在观察了1978年出土小南海石制品,并进行了实验打制之后,发现小南海的燧石裂隙发育,所以主要采用砸击法剥片,于是产生了许多细长的两级石片。安志敏先生把这些两极石片看作细石叶的雏形,所以得出了上承北京人文化,下启细石器的看法。从年代学上看,典型的细石叶技术在小南海时代已经出现在华北,因此不可能是细石叶技术的源头。



发掘研究泥河湾小长梁遗址



与安家瑗观察小南海石器



进行砸击法打片实验

在跨湖桥遗址的再研究中,我的问题是了解该遗址先民在全年周期中利用野生资源的生计模式和遗址废弃原因,并检验相关的农业起源理论。环境考古显示,每年不同的季节,该遗址都有不同选择的食物资源可供维持生计,冬季主要依赖储藏橡子。这使得遗址能够全年栖居。食谱中水稻比例不高,它的果腹作用显然并不明显。所以,它们的利用的一种可能是酿酒,一种可能是作为橡子小年产量不足时的补充。淡水和海水硅藻比例的变化显示了缓慢的海侵过程,湖水逐渐变咸,最终迫使先民放弃了这个遗址。我还认为,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的生态环境非常优越,食物资源非常丰富,因此稻作起源与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理论不合,而比较符合竞争宴飨的模式。就是在食物资源比较丰富的环境里,人们为了增加美食而利用某些劳力和时间支出较大的物种。当然,这些看法还需接受以后研究的检验。比如像贾湖那样,从陶器残渍中寻找酿造米酒的证据。

在文明和国家的问题上,我国学界过去偏重文献学和史学导向,关心何时与何地的问题,缺乏国际流行的社会发展动因的探讨和理论的阐释。因此,我在介绍一些相关概念、阐释理论和比较研究上花了不少力气,比如酋邦和社会复杂化概念,新进化论模式,文明起源的各种重要理论。我还强调研究文明崩溃的重要性,几乎所有酋邦和国家都经历了某种兴衰和轮回的轨迹,探讨这种轨迹的原因对现代文明社会的走向也有实际的价值。与西方传统相比,我国文明探源缺乏理论探讨,偏好来自文献的术语,许多概念缺乏严格和统一的定义,不善于将各种证据用逻辑推理来进行论证等等。我想,如果我国学者能够多接触国外的前沿研究成果,一定对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大有帮助。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这几年来我国的文明探源开始出现了逐渐向国际接轨的态势。



陪同加里·克劳福德和高宫宏仁参观河姆渡。



在第一届上海世界考古论坛上采访科林·伦福儒爵士

张萌：感谢您分享您的研究经历。在从地层学和类型学向学科交叉和科技考古的方法转变中，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发掘更多肉眼观察不到的信息了，尽管问题不明晰，也没有与之匹配的理论作为指导，但总算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数据量。我认为，中国考古学还未走出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理论突破尚未形成，各种新方法和技术却在大量涌入。这和我现代化进程中诸多观念、制度和经济发展彼此脱节相似。中国考古学要向前走，需要立足于世界考古学的基础之上，充分学习欧美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外考古研究和成果进行比较，由此才能形成中国的考古学传统。现在中国考古学在强调走向世界，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进行中国的考古调查，现在也开始去其它国家发掘，您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阶段呢，还是由于其它原因？应该如何看待和建立“中国的考古学派”？

陈淳：类型学是对显性材料的观察和分析，科技考古是针对考古材料包括生态物中隐性信息的提取。各种信息最后需要整合，通过逻辑推理来重建过去。收集何种材料、提取什么信息，都是在问题指导下合力进行的。这就需要在发掘之前进行研究设计，以便多学科途径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考古研究能以这样严谨的步骤操作，才能达到考古科学的最高境界。

现在中国考古学提倡走向世界，去其他一些国家进行发掘。这是一件好事。但要真正走向世界，也应该对他国的研究做出贡献。这需要对他国的国情，

包括生态环境、地质史和文化史、考古沿革和研究现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有的如中美洲国家，美国考古学家在那里进行了长期工作，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我们去那里发掘，需要了解那里的考古史和研究现状。做好扎实的功课，知道我们的发掘研究也许可以提供哪些新的洞见，这样的国际合作才有意义。国际合作也为我们尽快从理论方法上与国际接轨提供了契机，研究人家的材料需要采用国际通用的范式和话语。研究的成果也应该能够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内功修炼。我觉得，目前国内的考古研究与国际水准还有距离，还需努力提升。所以，目前强调走向世界，与其说能为其他国家的考古贡献什么，还不如说能够从国际交流中学到点什么。如果我们要建立中国学派的话，就像你说的，需要熟悉欧美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知道我们差距在哪里，能够做出什么新的贡献。如果有一天，欧美考古学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家创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那么中国考古学才算真正走向世界，才能自诩为中国学派。



与夏正楷教授在首届中国考古大会旧石器分会场颁发裴文中奖与贾兰坡奖

张萌：在四年的学习中，我尽全力几乎听完了我系提供的世界考古学课程，包括玛雅考古和南美考古，深知美国考古学家对新大陆研究之深，资料量之大已经到了很难望其项背的地步。新考古学的确立与美西南和中美考古分不开的，一百多年的研究史几乎涵盖了至今所有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我曾问过罗伯特·凯利一个问题，“美国考古学在最近五六十年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在思索十秒钟后，他说：“最大的贡献是和原住民的和解。”我很吃惊，因为我想的是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他接着解释，人骨归还和重新掩埋的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而《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与归还法案》(NAGPRA)与其它法案的出台与人类学家(包括考古学家)的参与直接相关。原住民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和考古学家一

道保存当地的历史景观。在中美和南美也可以看到这些活动的影子。各地的博物馆充分地收藏物质文化遗存，编目很是清晰，很多是志愿者和学生完成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多考古遗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您怎样看中国现在的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公众考古方兴未艾，您认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陈淳：是的，无论是中美洲、中亚还是其他国家，那里的考古历史可能比国内悠久得多，也积累了海量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要参与那里的考古工作并与我国内的研究课题相联系或做比较，了解和熟悉当地的国情和现有的资料必不可少，也是件令人生畏的工作。中国学者的知识背景大多限于国内考古，不像英美考古学家几代人一辈子专攻某地区的考古，成为这个领域的巨擘。所以，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并非易事，否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因为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美国考古学家与印第安人一直存在冲突，因为他们对于后者是外来者。这方面美国学界做得比较好，尊重土著的权利和诉求，并邀请土著参与文化资源管理，并为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共同努力。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考古学如今在国内十分流行。虽然在理解该领域的工作和具体操作上还有距离，至少学界同仁已经认识到提高公民遗产保护意识、为未来保存过去的社会责任。中国公共考古目前与美国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美国将遗产保护放入各种基建项目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之中。政府部门有专职考古学家参与项目的规划，而我国文物部门完全被排除在这种顶层设计之外，所以只能配合工程进行抢救，有时只能望着被拆除的古建和损毁的遗址哀叹。我觉得，我国抢救考古也需要有具体目的或问题导向，这种工作是抢救遗产的科学信息和历史价值，而非仅限于文物本身。如果它们在抢救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和信息永远丢失，那么这也是一种破坏。中国公共考古或公众考古还流于普及考古的形式，但是仍然任重道远。考古学家必须重视研究成果的二次解读，一次解读是指学术研究，二次解读是把前者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历史知识。这也需要考古学家内功的修炼，只有深入才能浅出。现在许多博物馆硬件设施很好，但是陈列展览乏善可陈，讲不出生动的故事，对公众难有吸引力。我觉得欧美许多国家的遗产保护工作和博物馆陈列可圈可点，值得借鉴。现在是学术全球化的时代，我国考古文物工作也要融入世界潮流，为更好保护历史遗产和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而努力。

张萌：你写的理论文章不少，所以常被看作是沙

发考古，是否觉得国内也需要一批这样的学者？

陈淳：国外将理论见长的学者称为 armchair archaeologist，国内译成沙发考古，意指不做田野，偏好清谈，带有贬义。其实，沙发考古并非随心所欲的凭空想象，而是需要相关的文化人类学基础、逻辑的推理和实证的演绎。我觉得，干考古如果只限于挖土和类型学研究，缺乏想象力是枯燥而乏味的。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则涵盖了整个世界”。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也可以被视为沙发物理，他的伟大贡献举世公认。考古学家是历史的侦探，是探寻失落世界的福尔摩斯，理论就是构建这种推理的想象力（假设或建模）。福尔摩斯办案首先是从表象推想案件发生的场景，然后寻找证据来锁定嫌犯。伦福儒说，考古学部分是缜密的研究，部分是从事创造性的想象。他还说，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的发展史。所以我希望中国以后能有更多学者从事沙发考古。当然一位学者兼备理论与田野的能力，那就更棒了。你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希望以后能见到你具有见地的理论文章，为发展中国的考古学理论多做贡献。

张萌：陈老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也期待着您更多作品的问世。

附：陈淳教授主要学术成果

（一）论文

- 1、《丁村遗址六十年与旧石器研究范式的变迁》，《砥砺集——丁村遗址发掘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2016年。
- 2、《文化与族群》，《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26日。
- 3、《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与谢银玲合著），《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 4、《谈考古学的问题意识与阐释》，《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7辑），2015年。
- 5、《继往开来的鸿篇巨制》，《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17日。
- 6、《谈考古学阐释》，《中国文物报》2014年9月12日。
- 7、《考古学的昨天与今天》，《科学》2014年第3期。
- 8、《谈考古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 9、《发展的历程及其代表人物》，《大众考古》2014年第1期。
- 10、《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 11、《考古学与人类起源》，《大众考古》2013年第1期。
- 12、《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考古学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13、《农业起源概念和理论的变迁》，《岭南考古研究》（第13辑），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香港），2013年。（与潘艳

合著)

- 14、《探究早期文明社会的世界观》，《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6辑)，2013年。
- 15、《陶瓷器研究的进展与思考》，《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5辑)，2012年。(与杨茜合著)
- 16、《早期文明的标准与解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
- 17、《从“专业”到“通业”：当前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 18、《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与潘艳合作)
- 19、《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的理论变迁》，《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与潘艳合作)
- 20、《人类如何了解自己的来历》，《我们是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 21、《美国性别考古学的研究与启示》，《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22、《泥河湾旧石器早期工业与人类行为》，《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地质出版社，2011年。
- 23、《马家浜文化与稻作起源研究》，《江南文化之源——纪念马家浜遗址发现五十周年文集》，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
- 24、《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 25、《发扬传统，锐意创新——〈时间与传统〉导读》，《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 26、《文明探源需多学科协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6日
- 27、《考古学认识的思考》，《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 28、《谈考古科技与科学考古学》，《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 29、《马家浜文化与稻作起源研究》，《嘉兴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 30、《科学思潮与早期国家探源》，《东方考古》2010年第5期。(与陈洪波合写)
- 31、《西伯利亚发现未知古人类》，《江汉考古》2010年第3期。(与陈虹合著)
- 32、《线粒体DNA确定一未知古人类》，《人类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与陈虹合著)
- 33、《北京人新传——读〈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
- 34、《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 35、《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与李琴合著)
- 36、Analysis of the Xiaonanhai Lithic Assemblag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0
- 37、《思想开放、积极开拓的一生——纪念旧石器考古学专家王建先生》，《中国文物报》2009年10月9日。
- 38、《作为历史科学的考古学》，《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 39、《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思考》，《东方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
- 40、《生态学视野中的跨湖桥文化》，《跨湖桥文化论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与潘艳合著)
- 41、《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 42、《再读跨湖桥》，《东方博物》2009年总第27辑。(与潘艳、魏敏合著)
- 43、《材料积累与历史重建》，《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14日。
- 44、《里程碑式的人物考古学变革的杰作——柴尔德与宾福德译著推介》，《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22日。
- 45、《能动性，当今考古研究的热点》，《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15日。
- 46、《为史前考古学带来一场变革的杰出论著——柴尔德经典代表作补读》，《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 47、《安阳小屯发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史哲》2008年3期。
- 48、《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回顾》，《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
- 49、《小南海遗址1978年发掘石制品研究》，《考古学研究》(第7辑)2008年。
- 50、Techno-typological comparison of microblade cores from 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In Y.V. Kuzmin et al. eds. Origin and Spread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ern Asia and North America, Burnaby, Archaeological Press of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7.
- 51、《跨湖桥环境变迁的新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2日。
- 52、Fire and flood management of coastal swamp enable first paddy cultivation in east China. Nature 2007, 449(7161): 459-462. (第四作者)
- 53、《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复旦学报》2007年6期。
- 54、Decipherment of Bronze Objects from Sanxingdui.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7, 3. (复旦学报英文版)
- 55、《纪念布鲁斯·特里格教授》，《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日。
- 56、《夏商是奴隶社会吗？》，《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30日。
- 57、《良渚文明崩溃研究——社会动力及与玛雅崩溃的比较》，《浙江文物考古所学刊》2006年第8辑。
- 58、《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第6期。
- 59、《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
- 60、《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与孔德贞合著)
- 61、《考古研究的哲学思考》，《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1日。
- 62、《人类探源：谁是我们的祖先》，《科学》2006年8月4期

63、《人类探源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17日。

64、《从东亚最早陶器谈跨湖桥和小黄山遗址年代》,《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6日。

65、《环太湖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与郑建明合著)

66、《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四川文物》2005年6期。

67、《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自然科学与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1卷第1期。

68、《中国考古学的历程与成就》,《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69、《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与殷敏合著)

70、《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自然科学与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1卷第1期。

71、《提升研究水准,更好保护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总第7期。

72、《马家浜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

73、《环境、稻作农业与社会演变》,《科学》2005年第5期。(与郑建明合著)

74、Earlitou, Xia and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 of China.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5.1. (《复旦学报英文版》,与龚辛合著)

75、《中国旧石器研究的进展和差距》,《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5日。

76、《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变迁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8日。

77、《环太湖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与郑建明合著)

78、《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与郑建明合著)

79、《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与龚辛合著)

80、《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9日。(与孔德贞合著)

81、《古蜀金器“射鱼纹”之我见》,《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27日。

82、《三峡古文化的生态学观察》,《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6日。

83、《考古发掘:谁来关注它背后的遗产保护?》,《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2日。

84、《考古学的人文关怀》,《文物世界》2004年第1期。(与王轶华合著)

85、《三星堆青铜器巫觋因素解析》,《文物世界》2004年第3期。(与韩佳瑶合著)

86、《张光直先生的遗产》,《文化遗产集刊》(第2辑),2001年。

87、Retrospect of Fifty Years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In Shen, C. and Keates, S.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Series 1179, Oxford, England, 2003.

88、《西阴村发掘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文化遗产研究》(第3辑),2003年。(与高书勤合著)

89、《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视野》,《复旦学报》2003年第4期。

90、《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国学术》2003年总第14辑。

91、《墓葬:个体考古学的视野》,《上海文博》2003年第2期。

92、《中国考古学80年》,《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1期。

93、《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思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

94、《考古学应当“与时俱进”》,《文物世界》2002年第5期。

95、《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

96、《小长梁石工业研究》,《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与沈辰、陈万勇、汤英俊合著)

97、《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第1期。

98、《文明进程研究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2年11月15日。

99、《“西汉纸”的质疑》,《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7日。

100、《谈酋邦》,《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9日。

101、《检视器物类型学》,《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2日。

102、《考古学的定位、视野与研究》,《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4日。

103、《微痕研究(低倍法)的探索与实践》,《考古》2001年第7期。(与沈辰合著)

104、《“夏娃理论”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日。

105、《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思索》,《中国文物报》2001年10月19日。

106、《谈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文物季刊》2001年第6期。

107、《秦俑坑与霸桥纸》,《纸史研究》2001年总17期。

108、《“操作链”与旧石器范例的变革》,《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年。

109、《重视社会史的通史陈列》,《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30日。

110、《周口店与贾兰坡》,《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

111、《增强考古报告的科学性》,《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

112、《文物学、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集刊》(第2辑),2001年。

113、《岭南史前研究的思考》,《岭南考古论文集》第6辑,2001年。

- 114、《考古学次生堆积的与探索》，《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与高蒙河合著）
- 115、《美国文化资源管理的镜鉴》，《文物世界》2001年第1期。（与顾伊合著）
- 116、《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东南文化》2000年第5期。
- 117、Settlement archaeology 与聚落考古，《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27日。
- 118、《再谈繁昌人字洞人工制品的真伪》，《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2日。
- 119、《论考古学的科学性》，《文物季刊》2000年第4期。
- 120、《考古学变革的理论建树——〈时间与传统〉导读》，《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1辑），2000年。
- 121、《考古学研究与信息提炼》，《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1辑），2000年。
- 122、《北京猿人的后裔是谁？》，《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26日。
- 123、《繁昌人字洞旧石器真伪问题和建议》，《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16日。
- 124、《中石器时代的研究与思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
- 125、《尼安德特人——人类演化之谜》，《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9日。
- 126、《旧石器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史前考古学的新进展》科学出版社，1999年。
- 127、《居址考古学的探索与启示》，《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
- 128、《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新视野》，《科学》1999年第2期。
- 129、《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与今天》，《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2期。
- 130、《谈谈考古学的新与旧》，《文物季刊》1999年第1期。
- 131、《河北原阳小长梁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与沈辰、陈万勇、汤英俊合著）
- 132、《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
- 133、《“西汉纸”公案及其他》，《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19日。
- 134、《周口店遗址又起争议》，《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7日。
- 135、《文物考古忧思录》，《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17日。
- 136、《夏娃理论与中国人的起源》，《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10日。
- 137、《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
- 138、《城市起源之研究》，《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
- 139、《两极法与 piece esquillees》，《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1期。
- 140、《聚落、居址与围墙、城址》，《文物》1997年第8期。
- 141、《考古学文化与文化生态》，《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
- 142、《谈旧石器精致加工》，《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4期。
- 143、《考古学方法论的思考与借鉴》，《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
- 144、《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 145、《古纸研究与考古学实践》，《中国造纸》1997年第2期。
- 146、《再谈旧石器类型学》，《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
- 147、《莫斯特文化新发现》，《化石》1997年第1期。
- 148、《旧石器研究：原料、技术及其他》，《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3期。
- 149、《国家起源之研究》，《文物季刊》1996年第2期。
- 150、《谈史前学的方法论》，《文物季刊》1995年第4期。
- 151、《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展望》，《文物季刊》1995年第1期。（与卫奇合著）
- 152、《谈中石器时代》，《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1期。
- 153、《为未来保存过去——美国与加拿大文化资源管理与合同考古学》，《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
- 154、《完善古纸研究的考古学范例》，《中国造纸》1994年第4期。
- 155、《东亚与北美细石叶遗存的古环境》，《第四纪研究》1994年第4期。
- 156、《史前技术之演变》，《文物季刊》1994年第4期。
- 157、《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 158、《考古学文化概念之演变》，《文物季刊》1994年第4期。
- 159、《谈旧石器类型学》，《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4期。
- 160、《石器时代分野问题》，《考古》1994年第3期。
- 161、《考古动物群数量统计》，《化石》1994年第3期。
- 162、《谈旧石器打制实验》，《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4期。
- 163、《类型、形制与类型学》，《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5日。
- 164、《古人类骨骼分析与史前研究》，《化石》1993年第3期。
- 165、《石器时代分野问题》，《考古》1993年第3期。
- 166、《几何形细石器与细石叶的打制及用途》，《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 167、《埋藏学与骨骼破损分析》，《化石》1993年第2期。
- 168、《考古学之演变》，《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 169、《废片分析与旧石器研究》，《文物季刊》1993年第1期。
- 170、《考古学理论、环境与阐释》，《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
- 171、《微磨损分析和旧石器用途》，《化石》1992年第2期。
- 172、《考古学文化的功能观》，《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23日。
- 173、《美国新考古学述评》，《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174、《民族考古学的译法、涵义及其他》,《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175、《埋藏学与遗址动态分析》,《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1日。

176、《考古学“相关性”浅论》,《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9日。

177、《谈谈民族考古学》,《中国文物报》1990年5月10日。

178、《谈谈考古研究中的“类同”与趋同》,《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22日。

179、Upper Paleolithic industries in North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Arctic Anthropology, 1989, 26(2):127-156,(与王向前合著)

180、《文物考古界改革开放之我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

181、《当代北美史前考古学介绍》,《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28日。

182、《保护不可再生的地下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1日。

183、《旧石器考古的非标准件及其他》,《中国文物报》1988年8月19日。

184、《太湖地区远古文化探源》,《上海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85、《三山文化:江苏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报告》(与张祖方、王闽闽等合著),《南京博物院集刊》1987年第9期。

186、《磨盘墩石钻研究》,《东南文化》1986年第3期。(与张祖方合著)

187、《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上海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88、The microlithic in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4, 3(2):79-115.

189、《中国细石器类型和工艺初探》,《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期。

(二) 译文

1、《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迈克尔·希著),《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2、《石器剥片顺序:术语及讨论》(布鲁斯·布拉特里著),《江汉考古》2012年第4期。

3、《类型学讨论三题》(德怀特·里德、理查德·沃森和帕蒂·乔·沃森、斯蒂芬·勒布朗和查尔斯·雷德曼著),《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4、《考古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威廉·亚当斯著),《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5、《考古学之想象:图像的情景化》(波希丝·克拉克森著),《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6、《石器技术的潜力》(唐·克雷布特利著),《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7、《石叶的要义:薄片技术与人类进化》(奥法·巴尔-约瑟夫和斯蒂夫·库恩著),《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8、《文化历史考古学述评》(加里·韦伯斯特著),《南方

文物》2012年第2期。

9、《考古学概念的考古》(贾洛斯拉夫·马里纳和泽德奈克·瓦希塞克著),《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10、《布鲁斯·特里格自传》(布鲁斯·特里格著),《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11、《现代人起源六十年之争》(约翰·霍克斯和米尔福德·沃尔波夫著),《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12、《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迈克尔·加拉蒂著),《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13、《社会进化的考古学证据》(乔伊斯·马库斯著),《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14、《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洛沙·福尔肯霍森[罗泰]著),《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15、《石器分析的式样、功能与形制》(亚瑟·杰里内克著),《文物季刊》1995年第3期。

16、《论文化的起源、传播与迁移》(布鲁斯·特里格著),《文物季刊》1994年第1期。

17、《驯化的模式》(布赖恩·海登著),《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18、《石片的形成》(布赖恩·科特雷尔和约翰·坎明加著),《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19、《论新考古学》(路易斯·宾福德著),《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20、《类型学与工艺技术》(弗朗索瓦·博尔德著),《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

21、《世界考古学展望》(布鲁斯·特里格著),《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22、《考古学与未来》(布鲁斯·特里格著),《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三) 获奖情况

1、《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2016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6年获上海第十四届图书奖二等奖、2016年获第十五届优秀引进版图书奖。

3、《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入选庆祝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成立25周年精丛。

4、《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2011年被“中华读书报”评为该年度10佳图书。

5、《考古学研究入门》2011年获上海市教委评选的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6、《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2012年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第二届优秀教材评选一等奖。

7、《骗局、神话与奥秘》2010获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活动办公室(中国文物报)评选的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

8、《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2004年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并被“中国文物报”评选为2004年最佳文博学术论著。

9、《二里头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一文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2004-2006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